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二辑）

国际纷争与和平

〔美〕卑尔（R. L. Buell）著 萧文哲 译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政治学（第二辑）

国际纷争与和平

〔美〕卑尔（R.L. Buell）著 萧文哲 译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纷争与和平/(美) 卑尔 (Buell,R.L.) 著; 萧文哲译述.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政治学)

ISBN 978-7-5520-1262-0

I. ①国… II. ①卑… ②萧…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 IV. ①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950号

国际纷争与和平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0-1262-0/D.376

定 价: 118.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三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美」卑爾 (R. L. Buell) 著 蕭文哲 譯述

國際紛爭與和平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初版

譯者序

(一)

本書係譯自美國卑爾 (Raymond L. Buell) 所著的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之第三部，原名爲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直譯爲國際紛爭之解決，意譯則爲國際紛爭與和平。爲顯示本書之內容的意義起見，故取意譯的名稱；其所以要意譯的原因如下：

國際關係一書之最後目的在求世界和平，而在探求和平之前，用推演敘述法，從國際的大問題，說到相聯帶的一切小問題，總歸結到一個求和平的中心思想。如第一部論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就是論民族受民族意識和情感之感動，與時代潮流之激蕩，而發爲民族自決；民族爲要自決，就發爲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因之引起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釀成帝國主義與弱

小民族的民族鬥爭，各民族爲保障其鬥爭勝利，不惜以大民族主義爲幌子，藉以擴充其勢力；爲謀大民族主義之實現，又不惜以經濟的民族主義爲幌子，使世界各民族皆在此幌子之下，求其自己的經濟利益，形成民族的國際鬥爭，釀成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的國家之劃分；同時民族主義又與國際主義發生衝突。第二部論帝國主義之成就，半由於民族主義的國家之過分發展，半由於帝國主義者侵略產業落後的民族，壓迫弱小的國家，一面形成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的國際鬥爭，同時，原料地，及海外市場等之帝國主義間的紛爭；一面形成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的國際鬥爭，同時又與赤色帝國主義發生衝突。所以前二部祇是敘述與解剖國際紛爭的來源與形成，而第三部才是討論解決國際紛爭之過去如何失敗，將來要如何才能成功。因此，故對於本部書名，決採用意譯，以符名實。

(一)

國際關係共三部，爲何單將第三部出版，不將國際關係整個的主部合併出版呢？其原因如下：

去年十一月在美國俄海俄省立大學研究院開始翻譯，至今年二月間，一二兩部均已譯畢，本部（第三部）亦譯成一半；彼時家遭匪患，奉命返國營救，二月底抵滬，本人即以國際關係之前二部已經葉秋原君先後譯成分別出版，（葉譯第一部爲民族的國際鬥爭，第二部爲帝國主義之政治解剖）。近見報載廣告，知神州國光社亦有人正在翻譯卑爾的國際關係，而脫稿付印的祇有前二部，第三部亦付缺如。這兩種譯本雖未及一讀，然爲避免重複計，遂將前二部譯稿棄置，不加整理，亟將第三部於百忙中譯完付印，補其所缺，此是原因之一。

前二部祇敘述與解剖國際紛爭的來源與形成，而本部（第三部）才進一步討論解決國際紛爭的過去與將來。本部先論保守同盟與權力平衡固然可以消滅國際紛爭，維持世界和平；然而終至失敗，且促成國際紛爭之尖銳化。次論國際會議，締結保安，裁軍，與廢戰等國際條約，固然可以保障各國領土的安全，維持各國政治的現狀，減殺國際紛爭之尖銳化；然而祇是苟安一時，終不免動搖領土的安全，破壞政治的現狀，再造國際的紛爭與紊亂。再次論到各種國際機關的設立，固然可以居中調解國際紛爭，或用法律裁判國際紛爭，或事前制定國際法限制紛爭的發生；然而帝國主義者所製造的紛爭，她們就多不願受調解，亦不願受裁判，所謂「無法律性的紛爭」

(Nonlegal Disputes)不受國際法庭的裁判，就是一例。所以卑爾氏於敘述過去解決國際紛爭與謀世界和平的種種辦法失敗後，最末啓示要永遠消滅國際紛爭及維持世界和平，唯有組織「人民聯盟會」(the League of Peoples)，代替國際聯盟會。於此可知本部（國際紛爭與和平）乃是前二部之目的的完成，或醫病的藥方。沒有本部，就不知如何方能消滅國際紛爭，如何方能維持世界和平。因為本部是醫治國際紛爭的藥方，而為醫生的不必定要寫病狀，却少不了開藥方，此是原因之二。

(11)

「國際」是甚麼？簡言之，即指二國或二國以上之國家，彼此相互對立，而形成國與國交互的關係。「紛爭」是甚麼？紛爭就是和平的反面；無和平，當無紛爭；無紛爭，自無和平；和平紛爭，互為因果。紛爭往往由於雙方因主張，權利，或意志之衝突而起一種互相傾掙，排擠，以至於角鬪的現象。和平起於紛爭之後，即為調和雙方利益或意見之衝突，而使之息爭，回復於紛爭前之和平的狀態。「國際紛爭」是甚麼？就是國與國間因種種問題而起的衝突。故國際紛爭乃

以國家與國家相接觸爲前提；若國家各自孤立而無交通，如老子所謂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其間固無往來，交際，同時亦無紛爭。中國在閉關以後，海禁未開，既無歐洲各國之迎拒，又無美洲各國之往還，各自孤立，絕無紛爭與和平之可言。今日海禁既開，中國又成爲國際競爭的焦點，將來不免因中國問題引起許多國際紛爭。爲供給同胞明瞭國際紛爭之發生與解決，以便應付將來的國際環境計，本書之出版，或許亦有相當的價值。

(四)

卑爾是個比較青年而最有權威之美國的國際政治作家。去年十月在美國會晤時，彼年方三十四歲，今年三十五歲，倜儻而富有精神，言論非常仔細，頭腦非常清晰，分晰政治現狀能力最強，相談移時，頗爲相得，其和藹可見一斑。卑爾氏自述，彼曾隨軍參加歐戰，遍遊歐洲諸國，並在法國巴黎大學讀書數年，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政治科教授，後充任外交討論會 (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 的指導員，兼任外務情報週刊 (Foreign Information Service) 主編。卑爾氏的著作很多，最著的爲下列幾種：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現代法國政治 Contemporary French Politics，

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戰後十年之歐洲(Europe: a history of ten years)、國際鴉片會議(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nference)、非洲人種問題(Racial Problem in Africa)、以及一九二九年增訂修改出版的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本書就是最後一種著作之最末的一部，也就是卑爾氏的傑作所在。

(五)

再說本書的譯例：

- (一) 全書概係直譯，間有意譯的，只是例外的例外。
- (二) 全書概用語體文譯成，即條約譯文，亦用最淺顯的文句譯成。
- (三) 譯者遇文義晦澀處，必須申述者加以申述，必須按語者加以按語，惟在按語開始，均冠有「譯者按」等字樣。

最後，我自知譯筆難免有欠妥處，這該由我負責向讀者預先致歉的；同時請求讀者遇譯文中
有文意晦澀，易起誤會或與原書不盡相符的種種謬點，深望勿吝賜教，自當於再版時加以修正。

文哲序於河南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教務處 二十年九月一日